

开卷丛书

# 市井悲喜剧

中国古代话本卷

卢兴基 编著

但见云暗江心，  
波涛滚滚，  
杳无踪影。  
可惜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姬，  
一旦葬于江鱼之腹。



育出版社

开 / 卷 / 从 / 书

# 巾井悲喜剧

中国 古代话本卷

卢兴基 编著

但见云暗江心，

波涛滚滚，

杳无踪影。

可惜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姬，  
一旦葬于江鱼之腹。

(陕)新登字 004 号

• 开卷丛书 •

市井悲喜剧

——中国古代话本卷

卢兴基 编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8 印张 4 插页 173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11,000

ISBN 7-5419-6561-8/I · 297

定价：11.30 元

# 面对绵延的高山巨灵

杨匡汉 汤学智

人生需要两种空间——物质的空间和精神的空间。作为文明之花的文学，为人类生存提供着广阔的精神空间。

人的生命如逝水，一去而不复返。惟文学与艺术，往往可以追回人们曾经有过的生命体验，或进入另一种足资向往的可能的人生。正因为如此，当你工余饭后，案前林下，一卷在手，古往今来，神游物外，可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滋润生命，抚慰心灵。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如良师耳提面命，有如友朋品茗夜话，有如情侣倾诉衷肠，亦有如听风听雨过清明……故古人有“开卷有益，不以为劳”之说。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人，企望视野的开放和精神的拓展，那就应该对文学，尤其是本民族文学，有深入的了解和体认，从而进至文明度更高的精神生活之中。

当你开卷时，你所面对的文学世界，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和浩瀚的。

从本质论角度看，文学是人学，也是心学。它是人的生命的律动，心灵的歌唱，是人的情感和智慧孕化的产物，是人的具有无限创造潜能的本质的自由显现。文学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内在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文学；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而且，只要人类还将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文学之花也一定会愈开愈鲜艳。在文学内涵中，最深

刻的便是它所体现的人的内在精神的普遍性底蕴；同时，由于任何人群、任何民族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成、发展和演化的，并由此铸造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个性，故而文学又自然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风貌和文学精神。

从本体论角度看，文学是承载生命信息的语言建构。在长期的文学积淀中，形成了由各种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文本构成的文体系统。以文体类型而论，文学由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基本类型构成；以审美需求而论，有俗文学与雅文学之别；以创作流程而论，又有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分。所谓民间文学，是指大多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反映民众生活愿望，并用口头演说的形式，在人民大众中间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所谓通俗文学，是指用通俗的书面语言形式表现大众所喜爱的生活内容的文学作品，大都流传于都市市民中间，也可称为市民文学。所谓雅文学，是指由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用比较高雅的艺术语言形式，表现某种比较深沉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层次与功能不同的各种文学共生互补，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学的百花园。每一种具体文学样式，每一部文学作品，也都有自己的灵魂与血肉。正是这些众多的“生命”，建构起文学的生命系统。

从发展论角度看，在历时方向上，文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共时形态上，它又包含了全世界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文学。同时，它还是一种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活的文学，人类正在不断地把自己从现实发展中展示出来的新质注入其里。因此，我们看待文学，必须站在本民族以至全人类共同创造所积成的巨大精神财富上，既不能割断古今，也不可划地为牢，应对文学的传统予以充分的尊重，对文学的创新持宽容的器度。

《开卷》作为普及性的大型文学丛书，旨在重点介绍和阐释中华民族文学、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有助于读者阅读，有必要对中国文学的常识，作一些说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有 5000 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学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中，汉民族文学始终居于主导的和中心的地位。早在文字发明以前，汉民族的文学就以神话和传说的形式，在人民口头诞生并流传了。像“女娲神话”、“羿神话”、“大禹传说”等等。这些独具特色、有永久魅力的上古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

中国文学的发展，一般按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古代文学，上起先秦时期的西周，下至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 3000 余年。

诗歌是产生最早、发展最充分、成就也最为辉煌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有“诗歌大国”之称，古代诗歌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前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者以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气势磅礴，想象奇特。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时期，进入黄金时代，诗人辈出，诗篇累累，形成了以律诗为标志的近体诗。宋元之间，同诗有着密切联系的两种文体“词”和“散曲”，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分别成为宋、元时代文学的重要标志，故有“宋词”、“元曲”之说。词和曲是诗与音乐结合的产物。它们比律诗更为自由、灵活，利于传情达意。

古代文学中产生较早的还有散文。散文的源头可推先秦时期的《周易》、《尚书》、《春秋》、《左传》以及《庄子》等诸子散文。古代散文的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百家争鸣中的诸子散文；二是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涌现了“唐宋八大家”；三是明清时期，诸如“竟陵”、“桐城”等流派的散文，

均异彩纷呈。

古代小说出现和发展较晚，这同它长期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邪宗”有关。小说虽萌芽于汉魏六朝，唐（传奇）宋（话本）时期均有长足进步，但比较繁荣发展的局面直到明清两代才出现。这是那时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明代主要是“拟话本”和通俗体长篇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以描写日常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小说《金瓶梅》，以及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已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转向描写现实社会的寻常生活，从而进入一个新的艺术领域。清代的《红楼梦》便在这一艺术方向上，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高峰。此外像《儒林外史》等等也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虽同“志怪”、“传奇”一脉，但在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中，包含着对自由幸福和光明的追求，成为文言小说的翘楚。

古代戏曲的开端是元人杂剧。杂剧包括“唱”、“念”、“做”等多种戏剧样式，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综合体。它最初以北京（大都）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很快传遍全国。元、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华古国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开始了急剧、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阶段，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史称近代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称为近代文学。

这一时期，政治上、军事上失败的现实，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国体的腐朽、文化的落后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在文学上有明显的反映，最突出的是资产阶

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在这种主张影响下，出现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老残游记》(刘鹗)和《孽海花》(曾朴)等一批以揭露当时社会黑暗为主的“谴责小说”。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进步的爱国的作家、诗人。自此以后，就其主流来看，文学与国家政治、民族命运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社会和文学进入“现代”时期的标志，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自“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多变，这给文学以直接的影响。“五四”前后，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随着自身的日益觉醒，要求文学更自觉地表现自己的斗争生活，并且在形式和语言上进一步要求通俗化、大众化。30年代后期开始了抗战文学时期，其中包括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以东北三省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学，上海的“孤岛”文学，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抗争文学。现代文学时期尽管只有短短30年，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仅使它彻底完成了文学采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内容上的深刻转变，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积极的革新和发展，开拓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从而使中国文学开始同世界文坛声息相通。这一时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艾青、曹禺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学40余年，在大陆，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颂歌文学”为主潮。到文化大革命，整

个文艺园地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的惨痛事实，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民族和历史进行深入的反省，这就促成了“反思文学”的出现。到80年代，反思由社会角度进入人的层次，继而又深入到民族的文化心理层次，遂有“寻根文学”之问世。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青年作家现代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倾向的探索。从历史眼光看，“文革”以后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突破性的开拓和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是新中国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包括同一时期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文学。台港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在与大陆相异的特殊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发展，有其明显的殊相，但同根同宗同文，其人文精神和语言风貌，却与中国文学传统命脉相通。台港地区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理应纳入“开卷”者们的视野。

中国文学又具有多民族性。除汉族外，尚有55个兄弟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民族，如藏、蒙、维吾尔、哈萨克、纳西、彝、满、柯尔克孜等族，都有自己的文学，这些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有不少优秀的民族作家。有些民族还出现了能以汉文写作的著名作家，如杂剧作家李直夫（满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杨讷（蒙古族），词人纳兰性德（满族），作家尹湛纳希（蒙古族）等。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除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外，还有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彝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以及苗族、侗族的诗歌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有如璀璨的明珠，与汉民族文学互相辉映，把中国文学的花苑装点得绚丽多姿。

中国文学历经了如此漫长的旅途。这片故园神州，是它丰腴的精神沃土，一代接一代地生长出文学之树、艺术之果。这世代相续、不断繁荣的文学艺术，恰似绵延的高峻山岳的巨灵，震撼着也温暖着人心与人生。我们为之自豪的还在于，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精神历来互相交流和影响，从而为文学的民族融合、艺术发展不断开辟着道路。中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始终是鲜明的、无可替代的。这也使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人文精神有其极为丰富的包容性，体现出举世公认的博大深远的气象。

基于上述的认知，《开卷》丛书力图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深入浅出的叙述，系统而又简要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华民族文学的基本脉络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之精华，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达此目的，~~丛书每卷取以‘文’为主、‘文’‘史’结合的编著体例，既侧重精述作品和文本笺注，同时对所涉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品类的概貌、特征、价值等进行史的分析~~。全套丛书共 24 卷，其中包括外国散文、小说、戏剧各一卷，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编著者皆在各自学术领域里耕耘多年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尽管如此，这套丛书仍然难以呈示伟大祖国无比丰富与恢宏的文学景观。但愿它作为广大读者的人生伴侣，携您共同步入辉煌的文学殿堂。~~

1993 年夏 北京

# 前　　言

卢兴基

## 一、中国古代小说的两大系统

在提到话本小说的出现时，文学史和小说史都把它视为我国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来看待的。但这里要纠正一个传统的观念，即它并不是文言体古小说——如唐人传奇的继承和革新，而是另一种新型小说的地位的确立。

历来认为中国的古代小说是在一个统一的小说观念和传统下产生的，即使在名称上，因其语言体式的不同而分别称之为“古小说”和“通俗白话小说”，或者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然后再别名为魏晋志怪、唐人传奇，明清笔记和话本、拟话本三类，但在探讨源流时，都统一在两汉最早出现的“小说”概念之下，以为仅仅是语言的不同，中国古代小说，早期运用文言，而后来让位于白话了。这多少是一个误会。中国古代的小说，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它的复杂性，与西方小说的创作方法更迭式的发展有所不同。至少，在研究上，我们要把宋元话本和唐人传奇这样的已经成熟的两大体式区别开来，分别探讨其源流。对此，笔者以前曾提出过一种意见：“我国的传统小说，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划分两大系统时，语言是它的主要标帜，即一类是文言的，另一类是白话的，两类小说虽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它们的渊源却完全不同；前者是文人

的作品，后者则主要是说书艺人的创造，后来才从说书事业中走出来，但文学形式仍各具特色。思想情趣上，文言的作品更多地向士大夫读书人靠拢，而白话的作品，却异源于市民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形成为迥然不同的两大体式，即散文式和话本式（后来发展成为“章回体”）的，而且分别发展着。两大系统的小说虽然起步的先后不同，但至清代，它们在语言艺术上都达到了各自的高峰。它们可以分别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出现为标帜。”（《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前言、语文出版社，1985年）美国学者P·韩南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两类小说的“奇怪的平行现象”，并注意到尽管“两类小说的素材有时是共同的，白话小说有时是对文言小说的改编，但这种改编却并不是单纯的翻译。作品改写以后完全变成另一种体裁，强调的方面有许多不同。”（P·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P·韩南可能无意于把两类小说视为源流的根本不同，而只是看作是“体裁的习惯力量”，但已注意到两类小说在语言形式的不同中所表现的不同审美意识，即宁愿改写而不作翻译。

我国史籍最早出现“小说”一词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然而与文学还没有什么关系。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鲁迅认为“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它令我们注意的地方是，第一，它的形式是“丛残小语”的记录；第二，可以起到“治身理家”的作用，与小说首尾完整的故事，让人得到美感愉悦还有很大距离，可以看出我国文言小说与笔记杂著有很大的关系。文言小说在史书中有著录。班固的《汉书》归到“诸子略”中，后世开了“子部小说”的先例，但唐初编定的《隋书·经籍志》，除了沿《汉书》之例以外，又把一些荒诞不经的神仙鬼怪性质的书，如《山海》、《穆天子传》、《神异经》之类归入史部中。后来史学家刘知几又把它总称为“偏记小说”。唐代的志

怪、传奇，就是从这种介于子史两部的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六朝以前，文言小说还处于酝酿时期，进入唐代，又吸收了史传文学和古文的笔法向前发展，步入了成熟期。总的说来，这一系统的小说，是为案头阅读而写；长短不拘，结构自如，常常是片断性的，有时甚至缺乏情节的完整性，作者一般都是知识阶层的读书人，渗透了文人的审美情趣。宋元以后发展起来的白话通俗小说显然属于另一个系统，它并非桓谭《新论》和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提到过的那种“小说”。

白话通俗小说在明以前不见正史的著录。它源于说书事业，以城市繁荣，商业发达，人口集中为条件，它是由口头艺术发展而来，与文人的书面创作几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它由说书艺人口头叙说，诉之于听觉，尽量适应城市群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水平，最初的通俗白话小说，就是这种说书故事的记录，因此，它的文化层次和艺术风格都迥异于文言作品。如果说，小说史常常提到的我国的小说备受歧视，小说事业地位卑下，通俗白话小说尤其如此。近代社会以前，大量的通俗小说未能留下作者的真实姓名。而文言作品则略有不同，它著在史籍，除了因年代久远而失考者外，凡有史可征者，作者的姓名大多赫然在目，而且不乏大诗人、大文学家如元稹、白居易、白行简，大官僚如牛僧孺这样的人物参与其事。六朝志怪，传有魏文帝曹丕的《列异传》，志人的作品，刘宋临川王刘义庆写了《世说新语》，蔚为大观。虽说余事为之，重视的程度不如诗文，但到也堂而皇之，并不视为卑下之事，和通俗小说很不相同。

说书的渊源，虽然可以远溯秦汉时的俳优盲瞽的讲唱，但这类活动，据文字的记载，尚限于宫廷贵邸，唐代开始扩展到市民群众的生活中。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虽然我们已知这个《一枝花话》，是指李娃的故事，但还不明确是谁

在说这段故事。但我们已知，唐代确实已有“市人小说”的存在，李商隐《娇儿诗》两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猜想三国的故事可能已经成为说书的书目。最可确切证明唐代已有群众性的说书事业并且已经有了说书人的说书底本的，是近代敦煌遗书的发现，其中的《庐山远公话》和《韩擒虎话本》可说是现存最早的话本小说了；此外，更多的是寺院俗讲的变文，也接近后世的小说。从形式上讲，许多作品还是说唱结合，韵散相同，与听觉艺术的关系密切，文笔粗朴，不能与同时代文人创作的传奇相比。但从这时开始，两大系统的小说即已开始并行发展。

宋代的说话，继承了唐代的说书和寺院僧讲，扩展了它的群众性。说话的家数中，尤以“小说”一家更受到欢迎，据吴自牧《梦粱录》的说法，小说又名“银字儿”，包括了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等内容。这是历史上再次提到“小说”的概念，与子部小说的“丛残短语”不是同一事物，它们之间也没有继承的关系，分属于两个范畴，这一区分，冯梦龙已注意到了。他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初也……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古今小说序》）他把通俗演义与传统所说的“小说”区别开来，指出他们源流与语言的不同。郎瑛《七修类稿》说得就更干脆，他说：“小说起宋仁宗（朝）。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若夫近时苏刻几十家小说者，乃文章家一体，诗话、传奇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说。”郎瑛所说的小说开始产生的时代为宋仁宗朝（1023—1063），乃前有“得胜头回”的话本小说，与用“文章家”笔法写作的小说，如“苏刻几十家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小说，非出于同一源流。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土壤中萌芽成熟，并且在艺术形式、审美意趣和风格等方面都

有着不同的风貌。产生的时间不同，但却有长期并行发展的历史。

## 二、两种不同的审美意趣与叙事方式

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互有渗透，互有影响。唐代寺院俗讲的时代，大量的题材取资于史书，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王昭君变文》。也有融合其他史料和传说的，如《孟姜女变文》、《董永变文》、《唐太宗入冥记》等。文言小说《李娃传》与“一枝花话”同一题材。但它们的审美意趣与叙事方式是迥然不同的。这里可以拿文言小说成熟时期的代表唐传奇与宋元话本作一粗略的比较：

一、唐人传奇受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乃至笔记杂著等古文写法的影响，采取纪传体散文的写法，作品的题目也多称之为“传”，如《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那怕渗入神仙鬼怪的虚构也可以为常，如《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而且文中必论证其真实可靠性；太史公的《史记》笔法，顽强地透入文言小说的叙事观念中，以至引起近代受西方小说观念影响的许多小说鼓吹家的不满。虽然白话通俗小说也有这一倾向，但文言小说更为明显。直至清代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每篇之末仍必附以“异史氏曰”式的史评。另一方面，小说和古文也常常相通，如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毛颖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童区寄传》等，既是古文，不妨也可以视为传奇作品。话本源于说书，以事为纲，重视故事情节，娱乐的目的较强，史传观念比较淡薄。采取说话体，以说书人的口吻叙出，除了第三人称的叙述以外，说书人也常常站出来用第一人称发表意见，它的结构由原来以一回书为说书单元式的短篇故事发展成为以“回”为单位的章回连缀体长篇小说。

二、传奇为案头文学，是写下来供阅读的，作者写作时必定考虑到接受者为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所以它的语言雅洁，而且可以

调动假借、隐喻、暗示等等修辞手段，行文可以剪裁、跳跃，读者不妨停下来品味，覆按其旨意。话本则不然，它是诉诸听觉的艺术，说书人要考虑尽量把话说得清楚些，甚至反覆交代。譬如《碾玉观音》中，咸安郡王府大火的晚上，崔宁无意中遇见秀秀从大火中逃出，后来成就一对夫妻，其间有一段往事，是造就这段姻缘的契机，所以在形容大火的紧密文字中还是插入了一段当日咸安郡王曾许诺将秀秀许配给崔宁的戏言的往事，表明崔宁和秀秀名存“痴心”和“指望”的心理。《刎颈鸳鸯会》中，蒋氏与朱秉中通奸被丈夫张二官撞见，张二官为何不做声退出，说话人当即插话交代，原来他已存杀机，去买刀计划捉奸。类此情节，必需当场交代清楚而尽量不留疑团的写法，是由面对“听众”保留下来的叙事方式。在文言小说中，对于这类情况就可由作者灵活掌握。话本则不然，有时，说话人对于一些蹊跷难明的事，往往还要直接站出来帮助读者解疑或分析。这时就需要有一段插话。如《错斩崔宁》中崔宁最后被判死刑的冤屈，有一段常被引用的插话：“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地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分析案情，需要停下来思考，而说书则不能等待，这一矛盾，由说书人插话代劳了，同时也可以借以表明作者的爱憎倾向。说话人站出来插话的作用重大，有时起着情节的穿针引线作用，有时交代主题，分析情节。读者明白这是在讲故事，起着“间离效果”的作用。这一方式，一直保留在通俗白话小说之中。

三、话本源于说书，它在公众场合讲说，有谋生的目的，讲求群众效应，所以题材追求有社会性，故事要求有头有尾，交代必须脉络清晰；而文言小说不把这些作为追求的目标。它虽然也追求艺术效果，但不考虑轰动效应。所写的故事可以是有头有尾的，如《李娃

传》之类,但也可能是人生的一个片断或某一故事的精华部分,它追求哲理的深度而不是故事的完整性。如署名牛僧孺的《玄怪录》的《郭元振》一篇,仅写了主人公除怪一事。薛用弱《集异记》中《王之涣》,写某一日的遭遇。裴铏《传奇》中的《裴航》写裴航落第遇仙。沈亚之的《异梦录》、《秦梦记》是梦的记叙,以上或写读书人的白日梦,或表达诸如大智者大勇之类的主题,不类于话本的社会广泛性题材。冯梦龙《古今小说序》在对比了文言和白话小说的特点以后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书面文学,直接得到内心的感受,通俗说书,广大群众从听觉中得到娱乐,两种手段不同,决定了文学语言和形式的差异。

早期的白话小说,即话本阶段的作品,诉诸听觉传达给接受者,它不适于长篇大段地静止的叙述,因为这样必然会使场面沉闷,因而长于在人物的行动和对话中刻画人物性格,表现心理活动。当需要铺叙的时候,比简古的文言小说更详尽,甚至添油加醋。这是因为口述文学要求连贯、周详,忌讳省略和跳跃性。《碾玉观音》里,咸安郡王看中了裱褙铺店主的女儿秀秀,托媒候前来说媒,与店主璩公相见有大段叙述和对话,包括了许多闲言客套,还有一首〔眼儿媚〕词咏秀秀的容貌和针黹绣作的本领,这在文言小说中必定会一笔带过,避免累赘。铺叙,是话本系统白话小说的特点。《忠诚张主管》里绒线铺员外张士廉年过六旬,托媒续弦,说出了一个条件,令“两个媒人肚里好笑”,但两个媒人还是商议如何帮衬去满足张员外的奢望,小说极尽铺叙、夸张与讽刺之能事。这都是它擅长的表现手法。

话本小说是在都市繁荣的条件下产生的文学,普通小市民、手工艺匠、商人,下层士人乃至乞丐、偷儿、妓女等等活动在城市的人物大量涌进小说,成为其中的主人公。一改过去文学中仕宦之族、读书人占据主要地位的状况。历史题材也让位于描写现实生活。说